

反思文学的力度及其局限

——重读宗璞的短篇小说《我是谁?》

陈进武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宗璞的《我是谁?》是当代反思文学的代表作, 由于小说对于“人”的呼唤和现代派创作手法的运用, 曾获得文坛肯定。重新细读《我是谁?》, 发现这部反思文学的代表作并不拥有真正的“反思”价值, 小说在叙事话语、悲剧性渲染和文学启蒙等方面都存在局限。

[关键词] 宗璞;《我是谁?》;反思文学;“人”的话语;文学启蒙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3)01-0089-04

The Strength of Introspection Literature and Its Limitations

——Review of Zong Pu's Short Novel Who am I

CHEN Jinwu

(Chinese New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er,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Zong Pu's Who am I is a masterpiece of the Contemporary Introspection Literature. This novel obtained a full positive laudation in the literary world when published, for its calling for “human” and its modern writing style. While reading this novel Who am I in the new times, we can find that this introspection novel does not have true “introspection” value, and it has some limitations in the narrative discourse, tragic rendering and literary enlightenment.

Key words: Zong Pu; Who am I; Introspection Literatur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literary enlightenment

当前,反思70年代和80年代文学的研究已成为重要的学术热点之一,反思文学作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自然也是“反思”的重点。回顾反思文学的创作,1979年,茹志鹃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首次以艺术形式鞭挞了“文革”前的极“左”思潮,当然,这篇小说也成为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第一篇“反思”之作。小说的发表带动了众多作家趋向相近的反思创作热潮,在这一批称之为“反思文学”的创作里,与《剪辑错了的故事》几乎同时创作的宗璞的《我是谁?》引起了文坛较大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在于小说呈现出的标新立异的创作手法,更在于这是一篇呼唤“人”的力

作。然而,细读文本,笔者发现宗璞的“反思”在叙事话语、悲剧性渲染和文学启蒙等方面存在局限。

《我是谁?》这部仅有5000余字的短篇小说完稿于1979年春,同年刊于《长春》12月号。在这里,宗璞提供了一个窥视“文革”特定环境中知识分子心灵及生存状况的窗口,从这个窗口望过去,映入眼帘的是那哈哈镜中既清晰又荒诞的种种形象:建国初期,知识分子韦弥和丈夫孟文起带着无限神圣感从国外奔赴祖国怀抱,然而,在“文革”中,他们被诬陷为“特务”和“牛鬼蛇神”,孟文起惨遭批斗

收稿日期: 2012-10-1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大众传媒与文艺理论创新”(10YJC751002)

作者简介: 陈进武(1985-),男,湖南益阳人,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

后不堪其辱而自杀身亡。韦弥的精神因此崩溃了,她用昏眩眼睛看到教授、讲师们、丈夫和自己都幻化成了只会蠕动的虫子。走向人生终点的韦弥始终在“寻找‘我是谁’的答案”,^{[1]122}但是最后在混乱、恐惧、绝望中疯狂地在荒地踉跄奔跑,冲进了湖水之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无疑,宗璞带着自己所理解的对于“我是谁”的追寻创作了《我是谁?》,并向努力社会呼唤关注“人”,关注“人的本身”,这些在小说中的体现也是明显的:在韦弥完全否定自我、纵身投湖的片刻,她在幽冥黑暗的夜空发现了一个明亮的、大大的“人”字;小说结尾,宗璞还强调,“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或者说,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1]125-126}宗璞的反思是站在“人”的立场控诉“使人成为非人的”的罪行,同时还质问着知识分子的操守:在重压下要不要缩头?在生死间要不要以丧失尊严为代价求苟活?

从文学史实来说,作为“反思文学”的代表作,《我的谁?》不仅在当时有力地呼唤着“人”,而且突显出关注知识分子的个人意识。正是有着这种对于知识分子及其品格的高度关注,宗璞始终以重塑知识分子崇高品格为己任,用30年心血创作了总名为《野葫芦引》(《北归记》正在创作)的《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等长篇小说。可是,当充分肯定《我是谁?》的价值与意义时,不免懒于去思考这部小说的反思局限与存在的不足。在《我是谁?》里,宗璞创作的本意是呼唤“人”、“人性”,但她不自觉站在了“敌我”二元对立的立场去关注迫害与被迫害的矛盾,暴露坏人罪恶,检视不幸者“伤痕”,最后的着眼点不是具有个人意识的“人”,而转入到“人民”、“群众”、“国家”、“革命”、“集体”等宏大的叙事话语中。其实,韦弥、孟文起之所以会自杀,并不仅仅是因为没有做“人”的资格,更因为没有做“人民”的资格,他们成为了“人民”的对立面。这种资格被剥夺的显著标志是他们赋予“特务”、“黑帮的红人”、“牛鬼蛇神”、“杀人不见血的笔杆反革命”等身份,之前关系不错的同事、朋友、学生,甚至小孩子都对他们喝斥着“打倒韦弥!打倒孟文起!”“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等革命口号,他们遭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伤害。韦弥精神委顿时,她想着的依旧是努力向“人民”、“党”、“国家”证明自己的清白:

她是来投奔共产党,投奔人民的!她是在飞向祖国,飞向革命!祖国呵,亲爱的母亲!革命呵,伟大的熔炉!……他们(指韦弥和孟文起)情愿跳进

革命的熔炉,把自己炼成千将、莫邪那样两口斩金切玉的宝剑。^{[1]124}

尽管《我是谁?》是宗璞试图自觉叩问“我是谁”这一主体性命题,但小说中的韦弥们的个体意识仍是依附于党和人民的,他们感叹没有献身的机会:为革命牺牲而不得,为人民献身而遭拒。在这里,自我认同和民族认同重合了,失去民族认同,也就失去了自我认同,这在表层意义上揭露了极“左”思潮对于人性的戕害,但从深层意义上来说,知识分子“失去身份”(或认同)并非“变成了一个个仅仅活着的个体”,或者展现出“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2]而是知识分子主体性最基本的缺失,即不被认同后那种“我是谁”的绝望呼喊,正因为从来没有所谓的知识分子之“我”,寄遇知识分子独立性的个体意识也是缺失的。当然,这里的“我”不是个人意义的“我”,而是宏大叙事的“我”,是个人的“我”成为了无数的“我”,这也从另一角度延续了“文革”文学创作的宏大叙事。实际上,五四以来,现代中国文学在“人”的视野中感受到在“铁屋子”生存的压抑之后,开始寻找真正的“人”之征程,然而,“文革”中知识分子们(包括宗璞)在体验到生存困境后,没能延续追寻“人”的征程,而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我”,他们争做的不是“人”,而是“人民”!在这一意义上,更深广突显了《我是谁?》的呼唤“个人”价值的要求实际上被宏大“人民话语”所遮蔽而不可能真正实现的悲剧性悖谬。

二

《我是谁?》是十年“文革”的真切再现,宗璞的这种真实是触发于现实的客观生活,主要是对真实存在的现实生活的如实反映,显示了现实的力量。谈到《我是谁?》的创作,宗璞坦言“直接触发是看到中国物理学的泰斗叶企孙先生在校园食堂打饭……他走路时弯着背,弯到差不多九十度,可能是在批斗会上炼出来的。一个人被折磨成那样,简直象一条虫,我见了心里难受万分,‘文革’的残忍把人变成虫!生活中人已变形了,怎能不用变形手法呢!于是我写了《我是谁》,抗议把人变成虫,呼吁人是人而不是虫,不是牛鬼蛇神!”^{[3]464}宗璞立足于认识社会、反映现实,书写的是心中之志,承载的是信念之道。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文化语境里,“文革”作为一段切近记忆、魔影威胁,而又不断被反思却不容反思的历史,早已远远超出或“震惊”、或“创伤”这样的词语所蕴含的意义。在这里,宗璞拒斥呈现暴力场景、拒绝但又追问“人性”,她以荒

诞变形呈现了这段历史中存在过的荒诞,为的是努力作一种政治反思与知识分子内省,^[4]这些是出自于一个劫后余生者自觉的一种责任,“许许多多人去世了,我还活着。记下了1966年夏秋之交的这一天。”^[5]把《我是谁》和宗璞其他中短篇小说(如《三生石》、《谁是我》、《泥淖中的头颅》、《蜗居》、《核桃树的悲剧》等)对比会发现,这些作品在“展示‘伤痕’的同时,还有内在深层原因的‘反思’,从人和社会的关系去发现人之价值,并转入对于人对自身的一种审视。”^[6]无疑,宗璞把创作基点置于忠实于生活、关注生活之上,小说所体现的荒诞也只能是生活本身存在的荒诞现象的本质性再现,更深的意义在于,宗璞赋予小说以积极的主题思想,试图以启发人、教育人、激励人,韦弥表面是追问“我是谁”,事实上是期望促使现实的“人”能觉醒。尽管存在从“人”到“人民”的叙事话语转移,但还是不可忽视宗璞在创作时所投入的这种努力。至少,这种强烈的现实感与作者、读者历经“文革”的体验相融合,增强了小说的悲剧感。

就《我是谁?》的结局来说,孟文起上吊自杀了,韦弥也投了湖,在这一意义上,宗璞写的也是悲剧,这悲剧来自外在、客观和特定的现实,主要是由于“文革”的特殊历史境遇而造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宗璞是把韦弥置入一个癫狂的状态之中来书写的。其实,这种疯癫的形象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颇多,如鲁迅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狂人日记》的主人公就是一个疯癫人物,可以说,狂人的“呐喊”掀开了现代中国文学描写疯癫形象的序幕。但这个“狂人”并非病理学意义上的疯子,而是当时社会里不为他人所理解的先觉者。当然,韦弥并非一开始就是疯癫的,因为她承受着不为“人民”所接受的困苦,忍受着剃成阴阳头的屈辱,接受不了丈夫自杀的事实,她的精神受到刺激,陷入迷失自我的状态:

谁是韦弥?谁又是孟文起?他们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该往哪里走?该向哪里逃?而我,又是谁呢?真的,我是谁?……我是谁呵?我——是谁?^{[1]120}

一定意义而言,疯癫者诸多的外在行为是非理性之产物,这些行为必然具有变形、扭曲和不连贯等一系列的特征。韦弥的所想所思,所作所为,基本是丧失个人意识下的行为,小说里,无数个“我是谁”的追问,给人一种难以呼吸的沉重感。鲁迅曾说:“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这些夸张,甚至带有某种偏执的思想和行为,以

及韦弥的死也就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与浓郁的悲剧色彩。可是,不无遗憾的是,宗璞这种“伤痕”的展示,对于这种悲剧色彩的渲染,却经不住过多的“推敲”。在《我是谁?》里隐含着这样一层含义:韦弥最终选择了沉湖,是由于现实之环境并不允许她继续活下去,韦弥之不幸是来自外界意志力之强加,假如在正常社会秩序中,韦弥一定能活得充实并且富于尊严,与“文革”前一样,韦弥还会有着憧憬与信念。尽管韦弥放弃了生,选择了死,她留给世界的仍然是“充满了觉醒和信心的声音”,因为她投向的是“终生执着挚爱的祖国——母亲的怀抱。”^{[1]125}还有什么比挚爱的“母亲的怀抱”更温暖,更有归宿感呢?正是这一意义的隐含,降低了作品的悲剧性,也使得“伤痕不怎么伤痕”,“反思也不怎么反思”了。

三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被公认为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相对应的此时期的文学思潮,即新时期文学也被视为是五四文学后的第二次启蒙文学高潮。当然,新时期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人的重新发现”及其不断地深化,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的发现”是遥相呼应的,刘心武的《班主任》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喊声,似乎是与1918年鲁迅《狂人日记》里那一句发出了立人的第一声“救救孩子”的呐喊同样振聋发聩,这使“历史的启蒙文学高潮感得到确证和强化。”^[7]事实上,“文革”时期,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就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我是一个人,我应该有个人的尊严”,这为新时期的启蒙文学思潮奠定思想的足音。对于“人”的向往与呼喊夹杂着情与理的激荡不断得以高扬,北岛(《宣告》)高呼“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舒婷深情呼唤:“人啊,请理解我吧”,还强调“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8]戴厚英也以噩梦醒来后的痛楚发出“人啊,人!”^[9]的真切感叹等。

可以见到,“文革”结束之后,人们开始从“阶级斗争”挣脱,重新审视起“人”的价值与尊严,而现代中国文学也试图追求从“阶级”话语(或者人民话语)复归“人”的话语,以再次接通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所倡导的启蒙主题。无疑,这种强烈的启蒙呼声不可能不触及到宗璞敏感的心,20世纪50年

代,宗璞就创作了《红豆》以启蒙理性向极“左”政治争取人的基本情感,她“以朴素的人道主义对非人化的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提出严正抗议”,这正“是启蒙文学回归伊始催生情、理风暴的重要思想背景。”^[10]当这种启蒙思潮复归之时,她也有这种深层表达启蒙的愿望,她“要把人当成人,这是西方启蒙运动的核心,我们需要这种启蒙。中国讲究名教,……忽略了人性、人权、人的本身,后来索性发展成把人当工具。……我写《我是谁》是站在人道立场,反对‘文革’时不把人当人看。”^{[3]463-464}应该说,宗璞的“我是谁”的呼唤比“人”的呼喊更为具体化,她呼喊的是——救救那些得不到人民承认的知识分子。卢梭说,古希腊德尔斐神庙大门上的“认识你自己!”这句话“比伦理学家们的所有的大部头著作更为重要也更难懂。”^[11]而宗璞也不仅在叙事话语和悲剧处理中陷入了自我缠绕,而且她“认识自己”的“人的启蒙”也不自觉地“缠绕”了,这也不免也影响到了《我是谁?》本应具有的启蒙价值与意义。

宗璞的父亲哲学家冯友兰在《新原人》里这样论述人:“人是怎样一种东西?我们可以说,人是有觉解的东西,或有较高级程度的觉解的东西。”^[12]然而,遗憾的是宗璞并没有意识到真正的人的“觉解”,原本是创作主体的宗璞和小说中的主人公韦弥等知识分子一样陷入把“人民”当做了具有个人意识的“人”。如果说子君(《伤逝》)“经过时代精神的洗礼从封建传统中走了出来,然而最终又被社会环境所吞没,成为碰壁失败的觉醒者”,她“走出了‘他者启蒙’即‘被启蒙’的第一步,而没有取得充分的‘自我启蒙’意识。”^[13]这揭示出“单纯依靠伟大的观念或启蒙者的誓言,并不能使个人完成启蒙的任务。”^[14]那么,韦弥不仅没有所谓“他者启蒙”,连“自我启蒙”的意识也是存在问题的,她没有个人性,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人民”的,她本身就不存有个人自由的理念,自然,韦弥们亟需“自我启蒙”,“不仅在于追求‘外在的自由’,更为重要的是解决和实现‘内在的自由’。”^[13]由此也可见,当时的宗璞没有这种对于真正理解“人”的意识,她只是停留在情感的释放阶段,始终未能上升到理性的思索层面,情感与理性未能得到很好结合,这也反映了《我是谁?》自身“存在着政治宏大叙事的因袭问题”,“又潜在地反映出作家主体现代性的不足和悖谬。”^[15]

总的来说,当时的宗璞尚无力超越自身的局限,

《我是谁?》这部反思文学里所隐含的不仅仅限于“反思文学”,还有着更多的意味,而宗璞赋予“我是谁”的大大“?”也留给了读者和研究者的丰富想象。不过,这种给予我们的“想象”至今仍在继续着,1928年出生的老作家宗璞已是84岁高龄,但是她仍然坚持文学创作,我们也期待着《野葫芦引》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北归记》尽早出版问世。当然,我们的这种“反思”不是去“贬低”老作家们的成绩,而是期望通过察觉到的这种局限与不足,我们意识到有必要再次去反思“反思文学”,反思文学创作主体与创作文本所存在的裂隙,反思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文学启蒙成果,以此来反观新世纪文学创作,这些仍有积极的、富于建设的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 [1] 宗璞.我是谁?//宗璞文集:2[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
- [2] 黄声波.权力·人性·知识分子——阎真官场小说《沧浪之水》研究述要[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13-17.
- [3] 宗璞,施叔青.又古典又现代——与大陆女作家宗璞对话//宗璞文集:4[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
- [4] 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00.
- [5] 宗璞.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宗璞文集:1[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41.
- [6] 赵树勤,陈进武.从“不会忘记”说起——宗璞与托斯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比较[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1(3):39-43.
- [7] 张光芒.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74.
- [8] 舒婷.诗三首[J].诗刊,1980(10):13.
- [9] 戴厚英.人啊,人![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 [10] 朱德发.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32.
- [11]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62.
- [12] 冯友兰.新原人//三松堂全集:4[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472.
- [13] 张光芒.启蒙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129.
- [14] 陈进武.读亦舒的《我的前半生》[J].文学评论(香港),2011(15):113-115.
- [15] 张光芒.重读《剪辑错了的故事》[J].名作欣赏,2010(4):12-13.

责任编辑:李珂